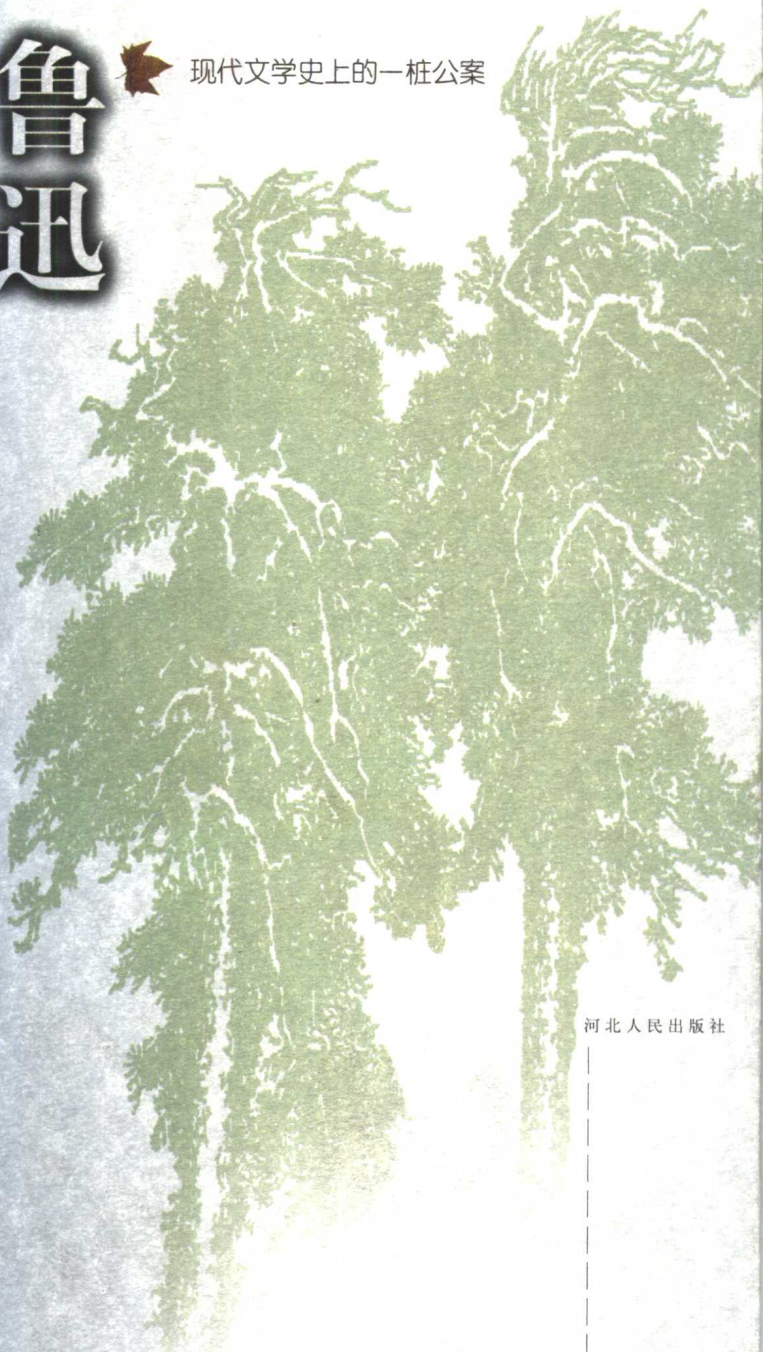


董大中 著

鲁迅 与高长虹



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与高长虹/董大中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8

ISBN 7-202-02496-9

I. 鲁… II. 董… III. ①鲁迅-文学研究②高长虹-文学
研究 IV.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3512 号

书 名 鲁迅与高长虹——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

作 者 董大中

选题策划 牛素琴

责任编辑 李良元

美术编辑 马少华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 版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60,000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202-02496-9/K·623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贾植芳

大中从 80 年代以来，致力于对山西的近现代地域性文化历史现象的研究。这里所说的地域性，其实是指他注目的研究对象都是出生于山西的作家，而他们的影响却是全国性的。我认为大中的这种学术研究方向，很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因为研究对象与研究者都是生养于三晋文化土壤上的不同历史时空内的存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根基。这种新角度新层次的研究，读之使人感到有一种新的亲切可信，多一层新的乡土文化气息。

80 年代初，大中首先对赵树理的佚文作了发微钩沉，偕同有关同志编辑了五卷本《赵树理全集》，使中外研究者对赵树理的认识和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入。1982 年、1986 年和 1990 年，又由他倡导与承办，先后召开了三次国际性的赵树理学术研讨会，并以与会的中外学者所提供的专题论文为基础，广为搜求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外专家有关赵树理的论文，编辑了三卷本的《赵树理研究文集》。他自己，以多年搜集整理的资料为依据，撰写了《赵树理评传》、《赵树理年谱》和《赵树理论考》。可以说，在国际性的赵树理研究事业上，大中的贡献与学术成就是很突出并富有历史意义的。从这个意义来说，称他为“赵树理研究专家”应是当之无愧。

大中完成了赵树理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之后，把目光转

NAF 76/10

向 20 年代以至 30 年代、以山西作家高长虹、高歌等为主干，曾得到鲁迅先生大力支持，在文坛消失多年的狂飙社的史料的搜集与研究。他首先致力于《高长虹文集》的编辑整理工作。记得他为搜求高长虹的作品，专程来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并于 1989 年在作家家乡山西孟县政协大力资助下出版了三卷本的《高长虹文集》。这套书基本上收入了高长虹这个传奇性的作家的各种文体的全部作品，以及未刊手稿。接着，他又编辑了《高长虹研究文选》，收入了各个历史时期各家对高长虹其人其作的评介和议论文章。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该书的附录，还收入了未见之于《文集》的若干则高长虹的佚文和书信。这一浩大的工程，为多年来在历史风雨中遭到湮没、在二三十年代崛起的这一文学社团——狂飙社及其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为我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缺门。

因收集和整理高长虹的资料，大中又萌发了对鲁迅与高长虹关系变化的研究兴趣。他把自己的视野放在鲁迅与之山西关系的研究上。既注重鲁迅在各个时期与山西人士的交往与接触，又注重鲁迅藏书中的三晋文献和晋人著述，更注重鲁迅对山西新文学发展的影响以及鲁迅逝世前后山西对鲁迅的研究纪念活动的文献史料。通过对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浩如烟海的史料的疏理和研究，他跟朋友合作撰写了专著《鲁迅与山西》，于 1998 年由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大中在从事鲁迅与高长虹资料搜集与研究的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思考，对高长虹的爱情诗集《给——》作了专题研究，写了《孤云野鹤之恋——高长虹爱情诗集〈给——〉鉴赏》。作为一家之言，为高长虹写这一系列爱情诗写作的历史与生活环境，即写这部诗集的动机与对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结论。

正是在多年来致力于高长虹史料的收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大中

又动手写《鲁迅与高长虹》，并来信希望我为他写几句话。

关于鲁迅与高长虹的交游关系与变异的议题，是文坛多年来的一宗历史公案，向来为学术界所注目。比如我与范伯群和曾华鹏两位教授主编并由我写序的大型专业学术著作《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一书，就收录了一位青年朋友汤哲声同志撰写的狂飙社专题，以及我应约为之写序、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崔洪勋和傅如一主编的《山西文学史》，都对这宗历史公案作了专题论述。现在大中根据他多年来搜集、整理的史料，以自己丰富的阅读经验和深入的历史思考与钻研，写了这部《鲁迅与高长虹》的专著。论述内容比《鲁迅与山西》一书更详细、更深入，材料也更丰富，并提出自己对这一历史公案的新知与新解，为这一历史公案的研究重新进行了发掘和审视。正如1987年我为《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撰稿同志能在尊重前人和今人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许多新的发掘和探索，抒发了不少新见；对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人和事，又能采取公允的审慎态度，作出尊重客观史实的理性陈述和分析，即未从主观感情色彩去看人论事，又能避免多年来那种直观武断的立论旧习。他们能从今天的历史高度，从更高的认识层次上，来审视和分析那些复杂纷纭、纠葛多端的历史上的文学现象，把历史研究作为一种认识手段，在冷静地论述和评价了这些文学社团和流派的历史活动的全貌的同时，更能从这些历史上的文学社团和流派在它们的思想和艺术实践中所积累的丰富的经验教训中，来汲取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所可提供的真正认识价值、理论意义与艺术营养，为我们专业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部既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又有新的学术意义的专题论著。”我虽然未曾目睹大中的《鲁迅与高长虹》原稿，但从大中寄给我的全书目录及论述要点上深切地体会到这部新著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因此我把多年

鲁迅与高长虹

前写的一篇旧文中的某些话移植到这里，我认为这并不是画蛇添足，而是表示了我对大中新著的评价、欣赏与认识。

我与大中既是新朋，又是旧识。拉杂地写了上面这些话，除过记述了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大中的学术里程和心路历程外，又为我们的乡谊与友谊留个纪念。

大中正是人到中年的一代，他的人生道路还长，我希望他利用自己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为山西近现代文化文学研究不断作出富有独特的学术个性和新的文化品位的努力和贡献！

是为序。

1998年9月下旬在上海。

序 二

陈漱渝

大中兄在他的新著《鲁迅与高长虹》行将问世之际，来函嘱我在卷首写几句话——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就是为他这本书写篇序言。以作序者跟原著作者的关系而论，大体上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由名家、前辈、权威作序，以提携后进；二是友人之间互作序言，类似于古人之间的酬唱应和；三是晚辈、弟子为前辈师长作序，以示对前辈的敬仰、推崇，并反衬出前辈的虚怀若谷。第一种情况常见。第三种情况似乎是近些年来新生事物。我为大中兄写序则属于第二种类型。当然，还有一些学者鉴于当今文坛有相互吹捧的陋习，为洁身自好，只用自序，拒用他序。我认为，这跟请人写序一样，是同样应该受到尊重的另一种处世原则，无可厚非。

回忆起来，我跟大中兄结交，大约始于1981年。在1980年12月号的《汾水》月刊上，刊登了一篇访问老作家高沐鸿的文章：《狂飙社及其他》，作者叫曹平安。我细读之后，写了六点“补正”投寄该刊，很快就收到了该刊编辑的回信，接着拙文就发表在该刊1981年7月号上。这位编辑就是董大中，从此便开始了我们长达17年的文字之交。

但我已经记不起跟大中兄会面的准确时间：也许是在太原召开的一次文艺理论研讨会上，也许是他到北京来专程拜访我。总之，他最初留给我的印象是未老先衰：头发黑白相间，耳朵聋得厉害，走路时略显佝偻。他

鲁迅与高长虹

的穿着特别平民化——说得好听叫朴实，说得难听就叫“不入时”。如果以貌取人，人们也许很难把他的打扮跟他作为一位有影响的评论家的身份联系起来。

当然，作家风格各异，而不是千人一面。比如同是作家，有“新感觉派”，又有“山药蛋派”；同是评论家，有的热衷于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有拘泥于传统理论。如果仅从大中兄的外形判断，把他视为“山药蛋派”的评论家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不但是研究“山药蛋派”的权威学者之一，又勇于更新知识，自我超越。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特别强，观念也相当新潮。这从他主编《批评家》杂志并在文学界获得广泛好评即可证明。此外，大中兄还提出了“艺术生产力是一门科学”这一命题，初步勾勒了艺术生产力学的基本框架。长期以来，文艺理论界把思想、生活、技巧作为创作力的三要素。记得在广州召开的《鲁迅研究的新路向》学术讨论会上，大中兄作了专题发言，将“知识”和“思维方式”补充进构成创作力的要素，使通行的创作力“三要素”理论扩展而为“五要素”理论。会后他将发言整理成文，交《鲁迅研究月刊》发表，受到了文艺理论界的首肯和好评。在《敲门集》一书中，大中兄还对电视剧美学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兴趣的广泛和知识的广博，使我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

使我更为佩服和感动的是他对事业的执着。他编辑了《赵树理全集》（五卷本），编纂了《赵树理年谱》，撰写了《赵树理评传》。经过他的四处奔走，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终于成立了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创办了《赵树理研究通讯》，多次筹办了赵树理学术讨论会。从此，赵树理研究不仅成为了山西的一门“显学”，而且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80年代以来，大中兄又将大量精力投入到高长虹研究之中。他在山

西孟县政协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高长虹文集》（三卷本）和《高长虹研究文选》，破天荒地召开了《高长虹文集》出版座谈会。随后又编辑出版了另两位狂飙社作家高歌、高沐鸿的文集。还印行了一本鉴赏高长虹爱情诗的小册子——《孤云野鹤之恋》。他的这些成果，不仅为研究山西籍作家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提供了数量可观的翔实资料，而且对于中国新文学流派史、社团史以及鲁迅研究也提供了可贵的相关史料。每当大中兄将他的新作一摞一摞寄来或一摞一摞送到我手上的时候，都会有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这是感激和敬慕之情的涌动，其中也不乏有几分怜惜——随着著作等身，他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令人忧虑……

对于大中兄这部专著本身，我发表不出中肯的意见，因为我未认真通读全稿，仅仅在他领衔撰写的《鲁迅与山西》一书中读到过若干章节。因此，我只能借题发挥，谈谈我对高长虹以及近期高长虹研究的一些印象。

高长虹是一位从20年代到40年代现身于中国现代文坛的作家，一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尤其是他跟鲁迅有一段由亲密合作到反目相向的曲折经历，更为广大读者所瞩目。鲁迅对高长虹有褒有贬，比如肯定他在编辑《莽原》周刊的过程中奔走最力，肯定他撰写的格言式的小文似乎还可观，肯定他早期作品中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当然，鲁迅对高长虹也有批评，甚至批评得十分“刻毒”。这主要是因为高长虹对鲁迅采取了先利用后打杀的态度，鲁迅退避无地，便采取了“拳来拳对，刀来刀挡”的态度。

有人把高长虹后来的落寞归咎于鲁迅对他的批评，我认为这是不够全面的看法。由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坛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对人的褒贬自然会比一般人的看法更有分量。跟鲁迅分道扬镳之后，高长虹在北京站不住脚，在上海也扎不下根，只好漂泊海外。高长虹后来投奔延安，也有人对

鲁迅与高长虹

他心怀偏见。甚至于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他的儿子也因父亲的所谓问题而身受株连。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高长虹的落寞主要还是取决于他自身。作家主要是靠作品立足于世。作品不倒，作家便会傲然屹立。高长虹本人也承认：“骄傲的作品比作家更值得骄傲。”除开高长虹之外，被鲁迅批评过的作家还很多。比如鲁迅轻视郭沫若，厌恶沈从文，挖苦徐志摩，跟周作人失和，对章士钊起诉，怀疑“四条汉子”系敌人所派遣……然而，上述这些一度被鲁迅否定过的人物却都以自己各具特色的作品和学术成就在文坛占据了各自的地位，其中有的人地位还很高。由此可见，鲁迅的评价对于被评价者毕竟不起生杀予夺的作用。

谈到高长虹的作品，自然也见仁见智。大中兄认为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于诗歌创作领域，而鲁迅认为他写得比较好的是尼采式的短句。记得鲁迅说过，《狂飚》上刊登的多是并不懂的科学，空洞的人类同情，新闻式的记载，广告式的自由批评，复制铜版式的新艺术。也就是说，狂飚社虽然提倡科学，但对科学并未精通，因而无法深入浅出地表达。提倡人道主义，又不免空洞，不切实际。发表的那些报道缺乏文学性，批评文字带有自吹自擂或互相吹捧的广告色彩。翻印了一些铜版画，但没有提供独创性的艺术作品。可见，鲁迅对高长虹乃至狂飚社的创作，总体评价并不高。高长虹厚厚三卷作品中，至今留在大多数读者脑海里的，似乎只有那首争论不休的《月亮诗》。

我以为，影响高长虹文学成就的原因，一是他思想方法的偏执，二是他创作风格的晦涩。偏执使他不能成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晦涩造成了他跟广大读者之间的隔阂。就高长虹提倡的狂飚运动而言，就有重行动而轻理论的偏颇。高长虹对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的看法，也存在许多明显的偏颇。比如他认为在“三·一八”爱国运动中殉难的烈士可怜则可怜，而无

可赞美之处。他认为女子解放的唯一途径是杂交，而忘了男人杂交后可以毫无后患，而女子是要受孕的，何能摆脱家庭之累？他还认为艺术就是暴动、就是起义，认为鲁迅的《呐喊》是很消极的作品，认为欧阳山的小说胜过了屠格涅夫，而闻一多的《洗衣曲》、《七子之歌》却在水平线下。他还提出了以电影代替小说的主张。高长虹的这些看法，只有片面，而无深刻，连“深刻的片面性”都谈不上。

在创作风格上，高长虹的前期作品相当晦涩难懂。比如《闪光》写的是：

a b c d,
打字机在活动了，
时代的呼声。
青春，青塚，面包！
贵妇之肉！
梦呢？爱呢？
一切，或无。
杀，杀，杀！

高长虹到延安后的诗作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即变成了标语口号，如“劳动技术化，经济工业化，大姐也是组织家，小鬼也是专门家”（《延安集》）之类。当然，这是指高长虹作品的总体倾向而言，并非说他的文集中毫无成功之作。

基于上述原因，就出现了一个令高长虹相当难堪的情况：广大读者大多是通过鲁迅的作品来认识他的，而不是通过他本人的作品来认识他的。

而在鲁迅的笔下，高长虹的形象又几乎可以混同于《故事新编·奔月》中的逢蒙。这当然是不够公允的，于是就出现了重评高长虹的呼声，出现了重评鲁、高冲突的文章。大中兄的这本新著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诞生的。

俗语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高、鲁冲突当然不是“家务事”，鲁迅对高长虹的有些批评也并非没有原则意义。但跟陈源与鲁迅之争、梁实秋与鲁迅之争，革命文学论争，“两个口号”之争相对而言，高、鲁之争并不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和学术理论意义。在诱发矛盾的诸多因素中，有一时误会，有乡土情结，有意气用事，有不易为外人洞察的种种人事纠葛。要条理清晰地理出矛盾产生、发展和终结的线索，并作出准确的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大中兄分析了《莽原》周刊和《莽原》半月刊的用稿情况，得出结论：“是安徽作家群（即未名社成员）不择手段地向狂飙社作家群（即山西作家群）争夺地盘，以致引起冲突。”对于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莽原》半月刊虽然沿用了《莽原》二字，又同样尊鲁迅为主编，但实际上负责编务和撰写稿件的成员不尽相同。大体上说，支撑《莽原》周刊的是以高长虹、荆有麟为骨干的莽原社成员，而支撑《莽原》半月刊的则是以韦素园、李霁野为骨干的未名社成员。这两个文学社团并没有组织上的渊源关系，两份刊物的篇幅、内容、风格也有明显不同。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等文中讲得很清楚：《莽原》周刊的创刊宗旨是提倡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莽原》半月刊事业的中心“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高长虹只不过是创办《莽原》周刊的“奔走最力者”。莽原社内部冲突之后，高长虹接着组织的是狂飙社。虽然高长虹认为《莽原》半月刊扣压了狂飙社同人的稿件，但似乎并不存在谁争夺谁的地盘的问题。

在近年来出现的研究高长虹的论著中，我感到有矫枉过正，过分褒扬高长虹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将高长虹晚年的萎缩归咎于客观环境，给读者的印象，似乎高长虹晚年是一个具有开放意识、民主意识、超前意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物，只是由于延安整风的严肃气氛和毛泽东对他的态度，才导致了高长虹的精神失常。而排除了有些知情人的另一种说法，即高长虹是一个内心封闭型的人物，到延安时已经思路不清。我是比较相信后一说的。比如他当时向毛泽东提出要到美国考察经济的要求，我认为表现出的并不是什么超前意识。提出这种完全违反客观条件许可的要求，本身就是思绪紊乱的明证。

总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星空上，高长虹曾经是一位闪光的人物，为他洗刷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也不必有意无意地淡化高长虹本身的弱点。在一篇题为《论错误》的文章中，高长虹写道：“一个最聪明的人就是随时能发现错误，永不让它把自己瞞哄过去的人。错误而仍自以为是，这是愚钝中的一种愚钝。他用聪明的衣服包裹着愚钝的心。”从这篇文章来看，高长虹并不失为一位聪明人。

不知不觉，拉拉杂杂写了上面这些或对或错，或有用或无用的话，算是跟好友大中兄的一次笔谈。总的态度，是对他的新成果表示推崇和敬意，其中个别跟他看法相左之处，完全是正常的学术分歧。在近日播出的电视剧《绿卡族》中，主人公赞叹美国人的处世态度：“吵架归吵架，朋友归朋友。”中国人何尝不也应该如此？



“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

50 岁时的鲁迅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诗稿手迹。

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畫
圖怡倦眼中甘苦兩心知
戊午冬十月九日之夜 魯迅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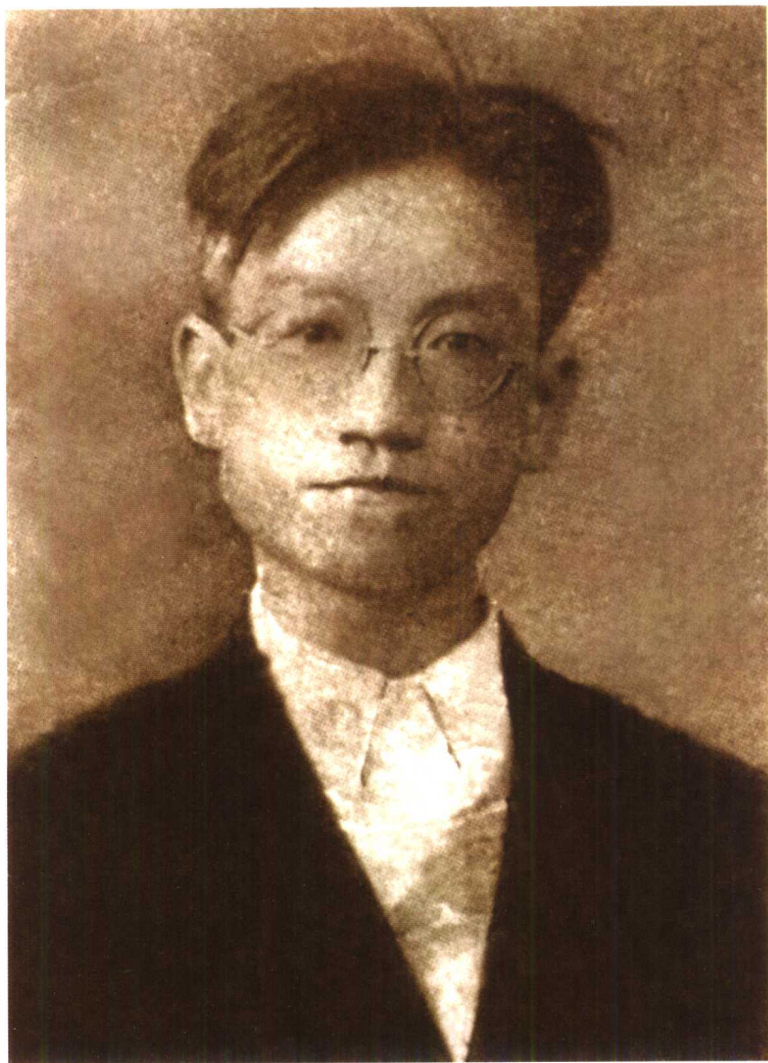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年
九月十二日

53 岁生日时，鲁迅一家合影



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鲁迅与青年们
在一起谈兴正浓……



高长虹赠给夫人的惟一留照（约1929年）